本版编辑：杨志梁
E-mail：m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经济学家

市场为何失灵

□ 王东京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后的百多年里，学界对自由市场一直推崇备至。不曾想，上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计划经济体，跟着三十年代西方又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这两件事不得不让人们对市场进行反思。而1936年凯恩斯《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更是彻底动摇了人们的“市场信念”，很少再有人相信“市场万能”的神话。

是的，市场并非万能，这一点今天经济学家大多都认可。目前大家的分歧，是市场为何会失灵？我所看到的教科书对此有三点解释：一是信息不充分；二是经济活动有外部性；三是社会需要提供公共品（服务）。实话说，我不完全同意以上解释，至少我认为信息不充分与外部性不是市场失灵的原因，公共品会令市场失灵，但除了公共品，市场失灵还另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我看来，学界今天大费周章地证明市场失灵，无非是想说明政府的存在不可或缺。或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缺陷。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赞成将信息不充分作为市场失灵的原因。理由简单，因为信息不充分政府也会失灵。我是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大学时期总听教授讲“计划经济是全国一盘棋”，可那时的重复建设却触目惊心。何故？请教过教授，教授说是由于政府信息不充分。

这就是了，既然信息不充分政府也失灵，我们怎能指望政府为市场纠错呢？事实上，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资源由市场配置比计划配置的代价要小得多。恰恰是由于信息不充分，资源配置才需要通过市场（试错），若信息是充分（或者对称）的，资源就可由政府配置，用不着市场。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把市场失灵归咎于信息不充分。

再看经济的外部性。不能否认，许多经济活动会有外部性，造纸工厂排放废水废气给周边造成污染，就是经济的负外部性。问题是，经济有负外部性市场就一定失灵么？上世纪六十年代前经济学家大多是这样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庇古，他对解决负外部性提出的方案是，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补偿给居民。此主张曾一度成为政府解决负外部性的经典方案。

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庇古。1960年，科斯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只要产权能够明确界定，市场就能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并以上面的企业污染为例，科斯说，政府若对企业的排放权予以限制，或者明确赋予企业排放权，通过排放权交易一样可解决污染，市场不会失灵。

让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因，即公共品。经济学说，公共品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公共品的消费增加而成本却不增加。我们知道，灯塔是典型的公共品，1848年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就是以灯塔为例解释市场失灵。他写道：“虽然海中船只都能从灯塔的指引中获益，但要向他们收费却办不到。除非政府强制收税，否则灯塔会因无利可图而无人建造。”

穆勒之后，公共品会导致市场失灵已成共识。可1974年科斯针对穆勒发表了《经济学的灯塔》，于是争论再起。科斯说，只要授权灯塔提供者可以向过往船只收费，市场就会有人提供灯塔。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学界认同。萨缪尔逊曾坦言，即便给灯塔提供者授权，收费也照样困难。由于对灯塔消费增加而成本不增加，灯塔服务无法定价；同时由于消费不排他，过往船只是否消费了灯塔难以判别，因而也无法收费。

萨缪尔逊的分析是对的。想深一层，政府若授权灯塔提供者收费，可正如萨缪尔逊所说，灯塔服务没有边际成本，怎么保证灯塔提供者不漫天要价？此其一。其二，退一步讲，即使灯塔服务能够合理定价，但如果有船主说他凭借经验就可安全通行，用不着看灯塔，灯塔提供者凭啥向他收费？这样看，有公共品存在市场必失灵无疑。

前面我说，市场失灵不单因为存在公共品，除了公共品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市场的分配机制。并非我的新发现，当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趋势时就讲过。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市场分配呈现为两极：一极是财富积累；一极是贫困积累。而且马克思断定，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果必发展为阶级冲突，最后剥夺者要被剥夺。读者想想，这不是市场失灵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分配，社会主义的市场分配不会两极分化。我可不赞成这看法。众所周知，市场分配的基本规则是“按要素分配”，只要要素占有或人们禀赋存在差别，收入分配就一定会出现差距，若差距过大就一定会产生社会矛盾。这是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并不在于市场会否失灵，而在于政府能否主动调节并缩小收入差距。

将市场分配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看作市场失灵，理论上不应该错。今天中国政府提出实施扶贫攻坚战略，目的其实就是要弥补市场分配缺陷。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思考，以往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可为何搞市场经济后收入差距就拉大了？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与市场分配机制有关。

最后顺便说说政府职能。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为何？弗里德曼讲有四项：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品与助弱扶贫。若从弥补市场失灵看，我认为政府的职能就两个：前三项为公共服务，第四项为调节分配。简言之，政府的作用，一是提供公共服务，二是调节收入差距。

如何提高经济治理绩效

□ 孙 剑

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有效的经济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经济治理一直进行不懈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治理经济的理念、方式、措施不断创新，正是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使我们稳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屡次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随着世界经济格局重大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较以往更为复杂，对经济治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提高经济治理绩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经济运行的内在力量是由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交织形成的市场机制，有效治理经济，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我们相机抉择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因势利导驾驭经济运行。在市场失灵之时，通过灵活精准应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行政手段，可以有效矫正经济运行的偏差。为保障经济治理切实有效，还需营造完善的法治环境。

提高经济治理绩效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我们党一直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演变可以看出，我们治理经济的初衷是期望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主要作用，而现实中，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处于待完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治理的绩效。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但是在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垄断行业价格形成远未市场化，这使得经济治理的绩效打了折扣。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传导至国内相关生产企业，既挤占了企业利润，又抬高了物价水平，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如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由于价格传导机制不畅，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未能充分获取价格下跌带来的收益，企业不能有效降低成本，形成了高于市场有效需求的供给，进而以产能过剩的形式体现出来；消费者不能减少相关产品的消费支出，势必挤占其他消费支出。在价格传导机制受阻的条件下，很难完成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的任务。

提高经济治理绩效需要精准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时期，我们党和政府调控经济运行侧重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时，抑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为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埋下隐患。另外，在调控时机上也不够精准。历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运行严重偏正常水平之后才开始治理，在经济增长到达波峰时紧缩，在经济增长陷入谷底时扩张，未能预留调控的时间差。提高经济治理绩效需要将调控重点转向供给管理，要转变过去脱离供给，单纯刺激需求的传统方式。要通过降低市场准入、放松管制、破除垄断、结构性减税等方式，激发供给侧的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调控方式上应尽量减少行政手段，尽可能采取市场化手段，避免行政手段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在调控时机上，要做到未雨绸缪，能够对经济运行进行前瞻性预判，在经济即将显露过热迹象时，就灵活出台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稍有低迷不振之时，就以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予以刺激。宏观经济政策领先于经济形势，政策稍一发力，经济形势就会扭转；宏观经济政策滞后于经济形势，调控绩效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提高经济治理绩效需要完善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治理经济离不开完善的法治环境。如果公司法、证券法、银行法、票据法、价格法、反垄断法、安全生产法等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将会严重影响经济治理的绩效。虽然我们规范经济行为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成型，但在执行过程中，地方保护、避重就轻、弹性执法、监管不力等行为仍是屡见不鲜。法律是约束社会各方行为的规范，不仅刑法、民法需要得到遵守和执行，经济领域的法同样应该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为了高效治理经济，我们必须要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法治环境。对于滞后于经济形势的法律要及时予以修订完善，对于新兴业态缺乏法律规范的要及时出台相应法规，做到既要依法惩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又要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经济活动，同时还要加强经济活动的监管，使一切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法治框架内。

宏观经济

经济时评

信用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 王 伟

诚信是社会运行的根基。信用，就主体而言，是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的态度和意愿；对社会而言，是对他人信用表现的评价和信赖。在一个社会中，追求诚信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也是对行为主体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诚信如同公平、正义一样，早已为人类社会普遍尊崇，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开篇即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是整个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的基础。其中，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是信用制度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中国古代高度重视商业诚信。《管子·乘马》中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其信用体系状况直接相关。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社会，从熟人交易转变为与陌生人的交易，快捷而有效的信息已经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在一个市场信用缺失，市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信息的社会，正常的投资、贸易、信贷业务等都会受到干扰，增大市场交易的难度和摩擦，扭曲资本市场的融投资功能，降低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给企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尽管市场经济摧毁了传统诚信，但是，现代诚信必然要依靠市场经济来进行重塑。因此，在经济交往和交易的道德风险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安全可靠的信用交易体系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而建设以市场主体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就是降低交往和交易成本、防范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信用建设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国家治理，是相对于国家管理而言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管理，强调管理主体只有国家机关，主张政府是万能型政府，强调政府的能力和政府权威，并运用政府的组织管理来管控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则强调民主和公共参与，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机关，还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是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主体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在经济领域减少政府机构的过多干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国民经济调节中的主导作用，社会治理方面要创新治理方式，保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治理的权利，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国务院的部署和安排下，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创新和改革政府经济管理方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放松事前管制，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因此，过去以设置许可、实缴资本、年检等由政府背书的经济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的需要。相应地，通过企业信用信息披露及其相应的信用体系建设，对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的社会制约，是在放松事前准入审批的背景下，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的重要措施。企业信用公开及企业信用建设，可以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对企业形成强大的社会信用约束，营造出失信者寸步难行、诚信者走遍天下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手段并用的有效治理格局。相比较过去那种过于依赖行政管制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依靠信用机制约束企业，是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

农业供给侧改革在地方如何发力

——农业供给侧改革“放心农业·衢江样本”高层研讨会综述

□ 吕红娟

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个新命题，也是一个新实践。近年来，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把放心农业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增长点，以发展家庭农场为切入点抓土地集聚，出台了涵盖农产品生产、销售、监管三大环节、八个方面的制度即衢江放心农业的八大体系，积极打造衢江区放心农业，使一个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迈进。6月18日，中央党校报刊社全面深化改革县（区）观察点揭牌仪式暨农业供给侧改革“放心农业·衢江样本”高层研讨会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召开。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农业现阶段的突出问题、如何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以及如何抓放心农业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衢江区委书记吴江平以“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衢江实践”为题介绍了衢江区放心农业发展情况。

为什么会发展放心农业？吴江平认为，农业工作，最终看的是产品，而产品，目前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安全问题、放心问题。老百姓要的就是两个字——放心。如何做到“放心”？2013年以来，衢江区系统谋划、分步推进，一年一个重点往“放心农业”走，从生产环节入手来使农产品放心，从制度层面规范放心农业的发展，通过品牌建设来做大放心农业影响力，从资本运作入手提升衢江农业企业的整体发展层次。

政府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吴江平提出，政府要引领调整政府资金的使用方式，嫁接市场与农民的桥梁，依靠科技力量、集聚高端要素，推动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吴江平说，经过努力，全区已形成三大农业板块：莲花传统农业提升区，目标是打造中国循环农业特色小镇；全旺现代农业样板区，目标是打造中国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富里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计划打造中国智慧农业特色小镇。

会上，专家们对衢江区发展放心农业、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进行了高度评价，同时为衢江深化放心农业发展积极出谋划策，“把脉”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方向。

专家认为，我国农业发展到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供给侧的问题。解决农业供给侧的问题重点是抓农产品质量、抓食品安全；要创新发展农业理念来抓农业，要把生产、生态、生活统一起来；此外，农业供给侧改革要真正做到增值、增效、增收，农业光增产不增值是不行的，农业增值了，综合效益上不去，也不行。如果前两者都“增”了，农民不增收，也没有意义。

与会专家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要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效益效率及市场竞争力的统一，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四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关键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多年的农业改革证明，真正能够对农村社会带来重大影响，是解决怎么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真正参与的问题。放心农业不仅仅是对产品要放心，最关键的是让农民放心去干。

专家认为，“放心农业”有着丰富的内涵。一般讲食品安全，是从纯消费者的视角来说的。而“放心农业”关注的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做得不好，农业也会污染环境，造成土地负担。“放心农业”既是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也是对生态系统安全的一种考虑。

“放心农业”的关键词在于“放心”。专家认为，“放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数量层面的放心，即能不能吃饱、农产品增产增收的问题；第二是质量层面的放心，即会不会吃坏、吃出问题，是不是有毒有害；第三是发展层面的放心，即能否可持续。衢江之所以能把农业供给侧改革和放心农业做出特色和亮点，是因为衢江根据我国当前主要矛盾和国情在三个“放心”之间选择了一个有机平衡点，较好地协调好了三者的关系。不是单讲数量，也不是单讲质量，更不是单讲未来层面可持续发展，而是通过“面向市场、依靠科技、激发社会”，转变农业产生方式，使农户真正融入市场本身，让市场机制倒逼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平，依靠科技的力量打造平台，建设诚信体系，同时激发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和消费者的参与热情。

对于未来如何进一步发展放心农业，与会专家给出了中肯的建议。专家们认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农户要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作用，应充分发挥四个主体的不同作用。一是政府。政府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是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重点任务是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政府要在政策、市场、信息、服务、技术培训上，提供帮助，支持、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二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参与极为重要。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由社会组织进行评控，农产品经检测后可以形成一个品牌，这种做法值得借鉴。三是企业。电子商务公司、农业公司等应充分发挥资金运营、品质改善、经营流通作用，发展优质农产品，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四是农户。怎样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农民真正去积极落实、推动区委、区政府的放心农业战略，并把它视为自己的事业去做，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衢江样本”究竟是怎样的样本？会议总结了“衢江样本”的五个“衢江体现”。第一是生态文明思想的“衢江体现”。衢江放心农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息息相关，是生态文明思想在衢江的体现。第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衢江体现”。绿色农业、有机食品的着眼点是产品本身，而放心农业的着眼点是消费者，从产品本身到消费者的着眼点的转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想的体现。第三是新的五大发展理念的“衢江体现”。衢江放心农业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新的五大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第四是勇于担当善于担当精神的“衢江体现”。作为区县一级领导，对于中央提出的重大发展理念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是一种政治体现。能提出放心农业，本身就是一种承诺、一种担当精神。第五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衢江体现”。衢江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探索性实践可圈可点，选什么样的突破口，从什么地方入手，路线图怎么制定，衢江都做了努力，努力的方向值得肯定，值得研究。

热点透析